



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

周大鸣 主编

超越乡土社会

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
文化与社会结构

● 刘朝晖 著

民族出版社

超越乡土社会

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 与社会结构

刘朝晖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刘朝晖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

(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周大鸣主编)

ISBN 7-105-07175-3

I. 超… II. 刘… III. 侨乡-乡村-研究-中国
IV. D6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283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公司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2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总序

人类学传入中国虽然已超过整整一个世纪，但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真正发展则是近年的事。而学科建设中最具有显示度的是博士点的建立。自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大陆惟一的博士、硕士和学士授予单位（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台湾的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也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直到1998年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建立起人类学的博士点才改变这种局面。

进入21世纪后，人类学也迎来了新的世纪，首先是人类学科点在更多的大学建立起来，如博士点除原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外，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也有了人类学博士授予权；人类学硕士授予单位已经超过20个，如武汉大学、上海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实际上还有许多人类学方向设在别的学科点下招收博士、硕士，如复旦大学招收“体质人类学”博士和文学人类学硕士、博士，中国音乐学院招收“音乐人类学”，中国刑警学院招收“法医人类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艺术人类学”，华南师范大学招收“体育人类学”等等，不胜枚举。其次是人类学研究机构增多，如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成立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以及一批民族院校等也相继成立了人类学的研究机构。第三是中山大

学和北京大学的人类学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这是国家首次在人类学设立重点学科，这样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人类学的建设。第四是2003年中国在意大利获得2008年第16届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的举办权，以此为契机，将有更多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和学科点建立起来，同时也将有更多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问世。第五是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是教育部首次设立人类学的重点研究基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我国第一批博士授予单位，招收人类学的博士已经超过20年，培养了一批博士并成为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2004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开始招收“历史人类学”专业博士生；2001年人类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使我们有专项经费来组织科研和出版，优秀博士论文的出版就是“人类学民族学文丛”出版计划中的一部分。选择博士论文出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学位论文，是衡量学科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尺之一，我们把博士论文的写作视为博士生培养最重要的部分。一篇合格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从写作到通过需要“过五关斩六将”，首先是选题计划，然后是试调查，作开题报告，进入正式的田野调查，论文初稿完成后举行预答辩，补充调查和修改论文，最后进行论文答辩。本次组织博士论文的出版，是从通过答辩的论文中挑选，并要求作者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再作修改才入选的。

我系人类学专业是按照方向来招生的，而这些方向代表了我系研究的特色；我们计划将博士论文按照培养方向分系列出版，每个系列3~5本，第一批以“都市与乡村社区研究系列”出版，并将陆续出版“宗教人类学”、“族群与区域文化”、“历史人类学”等系列。

我系强调坚实的田野调查与独立的理论思考结合的培养方

针，博士论文应该体现出办学的风格和学科发展的特点，本次博士论文的出版可以说是对我系学风和风格的一次检阅。我们期待着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和指导！

周大鸣

2004 - 12 - 28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	(3)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22)
第三节 人类学对复杂社会的研究	(34)
第四节 研究的主旨、思路与框架	(40)
第一章 走入村落社会	(49)
第二章 人文历史与社会结构	(58)
第一节 人文地理背景	(58)
第二节 血亲的传承与人口的成长	(61)
第三节 空间聚落与宗族结构	(69)
第四节 婚姻形态与家庭结构	(77)
第三章 移植的社会	(89)
第一节 过洋贩番 移民南洋	(89)
第二节 移民的家庭与婚姻	(98)
第三节 在槟城重塑故乡	(107)
第四节 龙山堂邱公司与槟城华人社会	(120)
第四章 跨越海洋的乡土之恋	(128)
第一节 从槟城到海沧：三都联络局	(128)
第二节 诒谷堂的重建与宗族文化复振	(132)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与民间文化的复振	(143)
第五章 民间信仰	(147)

第一节	祖先崇拜	(147)
第二节	神祇信仰	(148)
第三节	基督教	(157)
第四节	作为文化展演的民间信仰：3. 15 进香	(159)
第六章	教育	(171)
第一节	传统私塾教育的转型	(171)
第二节	华侨影响下的新学教育	(173)
第三节	走向公立的国民教育	(177)
第四节	民工子弟学校教育	(182)
第七章	社会控制	(189)
第一节	百年沧桑：新江社会的权力“博弈”	(189)
第二节	现代国家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199)
第三节	“第三种力量”	(211)
第八章	侨乡认同的建构与侨资走向	(218)
第一节	“诒龙花园”项目的缘起、经过与结果	(218)
第二节	各相关利益群体的观点与看法	(230)
第三节	侨乡认同的建构与侨资走向的相关性分析	(233)
第九章	“8. 16”拆房事件的调查与分析	(243)
第一节	“拆房现场的回忆”	(243)
第二节	“我的委屈”	(245)
第三节	“讨个说法”	(249)
第四节	拆房的反思	(253)
第十章	都市经历	(259)
第一节	新江邱氏的土地	(259)
第二节	新江社会的集镇化	(263)

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

第十一章 都市生态	(272)
第一节 外来工	(272)
第二节 违法建房与出租屋经济	(291)
第三节 村里的集市	(296)
第四节 乡村都市化	(300)
第五节 市民社会的困境	(303)
第十二章 社会问题	(309)
第一节 就业与失业的困境	(309)
第二节 作为保障的“土地资本”	(312)
第三节 社会分层与两极分化	(324)
第四节 被“拷问”的土地补偿费	(326)
第十三章 结论：超越乡土社会	(330)
第一节 新江社会转型的历史视角 与未来的抉择	(330)
第二节 村落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	(338)
第三节 超越乡土性：全球化 背景下的村落社会	(345)
附 录	(350)
参考文献	(387)
后记	(396)

导 论

生物学家说：飞蛾在作蛹之时，翅膀萎缩不发达；出茧时必须经过一番挣扎，身体中的体液方能流到翅膀去，两只翅膀才能有力在空中飞翔。

有一个人恰巧看见树上一只虫茧开始活动了，整个早晨，他耐心等在旁边观察。蛾在里面奋力挣扎，还是不能挣脱，似乎再也没有可能出来了。

最后他的耐心用尽，就用一把小剪刀把茧上的丝剪了一个小洞，让它出来可以稍微容易一些，果然，没有一会儿，蛾就很容易的爬出来，可是身体反常臃肿，翅膀也异常萎缩。它痛苦地爬了一会儿就死了。

每次行进在村里，看到村落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倾听村民跟我娓娓道来的家长里短，我分明地感受到他们似乎也正在遭遇自己的“蛹茧之变”。我将要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这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变迁的故事。

作为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滨海村落，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看到沧海变成桑田的岁月痕迹：现在厂房林立的工业区就在百年前却还是一片浩瀚的海洋，那曾经舟楫云集的古埠，如今只剩腰折的条石和依稀可辨的青石台阶，还有那不堪风雨浸淫，早已出现斑驳和残垣的闽南式的“规庭院落”，它们似乎都在述说着这个村落的往昔。

新江邱氏从元末明初自此开基以来，繁衍至今凡二十六代，

历六百五十余年。从族谱考证，到明中后期，新江邱氏就发展成为一个宗族力量比较强势的人群共同体，随后便开始向海外移民，移民大多数聚集在今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地，这些地区就是他们所谓的“南洋”。至清中叶，“下南洋”的族亲已经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基业，他们在马来西亚檳城的侨寓地“复制”了新江社会，形成一个“双边共同体”。

此后，新江跟南洋的宗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都具有鲜明特色的侨乡村落。受益于侨汇经济，新江在20世纪初出现了较繁荣的“集镇化”特色。1934年，社会学家陈达主持新江调查时，发现这里村民的生活大部分是依靠南洋的“批款”。笔者在调查中也得知，在消费结构方面，那时村民的衣食住行大多依赖南洋。据村民回忆，他们当时多数家庭吃的是“仰光米”，穿的是南洋来的“洋布”，住的是祖上用“批款”修建的闽南“规庭院落”式的传统民居，就连日常用品也多是“南洋货”。那时，村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周边的临近乡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日军先后占领了厦门和东南亚各国，南洋的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战争割断了南洋华侨与国内的联系，村民只好完全依靠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水平渐趋下降。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90年，厦门市政府在新江所在的区域成立了“新阳工业区”，开始大规模地征用新江及其相邻村落的土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有许多的外资公司、合资企业和原来在厦门岛内的各类企业陆续进入工业区，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的进程不但改变了新江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更为深刻地影响了它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结构。新江逐渐由一个农耕社会变成为一个工商业社会。

变是永恒的，不变的是生活在这片故土上生生不息的人群和他们对乡土的依恋之情。我一直都在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新江现在

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

的这种“集体不适应症”？难道仅仅就是开放改革这个“社会事件”而导致的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审视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的关联性？如果不是，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变化？也许问题的本身根本就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逻辑，对于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村落而言，其社会文化变迁的复杂性足够让我们做出学理性的思考：我们该如何表述村落？村落社会研究的意义何在？要关注哪些内容才能反映出村落社会的变迁，以及村落社会是如何与更大的社会空间——比如全球化——产生关联等等问题。

第一节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

1. 村落研究述评

通过对村落这样的微型社区进行研究，从中透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本质，应该说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独有建树。经典的个案，在20世纪中叶以前有如葛学溥的“凤凰村”、杨懋春的“台头村”、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义序”和“黄村”、杨庆堃的“鹭江村”、威廉·韩丁的“长弓村”（即张庄）等^①。

① Daniel Harrison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美】杨懋春 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

Yang C K,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Hinton, W.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Press, 1966.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对村落的调查研究一度沉寂下来，到了 80 年代以至今，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外学者再次掀起了研究中国村落社会的热潮，出现了陈佩华（Anita Chan）等的“陈村”、黄树民的“林村”、王铭铭的“溪村”、阎云翔的“下岬村”、折晓叶的“万丰村”、张乐天的“联民村”、毛丹的“尖山下村”、于建嵘的“岳村”、吴毅的“双村”等^①。

他们都是试图通过对一个村庄这种“小型的简单社会”进行全景式的民族志研究，来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尽管他们的研究都是从问题的一个侧面出发，但其中表现出对中国村落生活的“深描”，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丰富的人文类型。

一般地认为，中国的村落是相对独立的、封闭的聚落空间，所以，传统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的研究，通常的田野工作范围只局限于一个小村落，注重村落社会的“共时性”研究，忽略“村

① Chan, A., Madsen, R. & Unger, J. *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A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北京，三联书店，2002。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阎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 世纪川东村的表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落以外”的广大区域社会，而且普遍都是根据功能的观点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从20世纪中期以来，对村落社会的调查出现了两种新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关注“村落社会”之上的集镇，或者说乡镇。这个转变正如劳格文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所在地往往是设墟的地方。在历史上，历代王朝统治的官僚建制都只是到县，县以下的大片地区并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因此，墟市即现今乡镇所在地在当地的乡民社会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则介于两者中间而被忽略了。”^①另一种还是注重村落社会，不过，从调查范围和研究主旨上都有了相当的改变，突出地表现在通过对多个村落的调查，凸现从中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以及试图以此建构中西方村落研究的理论对话平台。

相关的研究大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1946年，田汝康考察云南“芒市”（镇），在傣“摆”的仪式上看到了生产、消费和信仰之间的关系^②；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时，也发现了对个体村庄研究的局限性。施坚雅对四川成都平原的集镇调查表明，看似“孤立”的小村落，其实是通过紧密的层级市场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③；萧凤霞对广东新会环城区的调查认为，20世纪以来，由于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渗”，造成了村落社会权力体系的“细胞化”，消解了村落权力的“内敛性”^④。这种基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① 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香港，法国远东学院、国际客家学会、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会出版，1996。

②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

③ 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④ Helen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让我们的研究视野不仅超越了村落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萧凤霞的研究让我们站在“村落社会”里看到了“国家权力”的力量，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而台湾的庄英章则把“林祀埔”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置于区域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之中，不但拓宽了我们的空间视野，而且还延伸了我们对地方社会研究的历史视界^①。

其实，多村落的调查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可圈点的如李景汉对北京郊区挂甲屯四个村子160户家庭的调查^②；20世纪30年代陈达对闽粤侨乡的调查也涉及了十数个村落^③；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多个村落的调查与“实验”^④，还有费孝通、张之毅等的“云南三村”^⑤，较晚近的有王铭铭的“闽台三村”^⑥、项继权的“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⑦，肖唐标等的9个“宗族村落”^⑧，以及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人对中国内地的22个村落的调查等等^⑨，不一而足。

不过，他们的研究旨趣不是立足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而是

① 庄英章：《林祀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② 李景汉：《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③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④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⑤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⑥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三联书店，1997。

⑦ 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⑧ 肖唐标：《村治中的宗族：对9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⑨ 张厚安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试图回答，或者说是检验基于村落社会研究所引发出来的诸多“问题”上：李景汉为我们展示了村落社会里的家庭结构和家户经济；陈达想以此审视南洋华侨对于家乡所产生的影响；“乡村建设运动”的发起者想以此实验摸索出“改造中国乡村社会”的“良方”；而“云南三村”却想通过研究“草根工业”和土地制度之间的关系，寻找一个可与“江村”进行“类型”比较的基础，至于王铭铭、项继权、肖唐标、张厚安、徐勇等人的村落研究则更是立足于检验和反思现代性、集体经济以及村落治理等“大问题”上。

多村落的调查特别要提到的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中国华北农村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尽管这个调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但是它所积累的33个村庄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料，为后来的一系列研究奠定了田野资料的基础，如马若孟（Ramon Myers）据此写出的《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了近代中国的村庄和农户的组织、职能及其变迁的问题^①；黄宗智据此撰写的《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描述了20世纪的自然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演变关系^②；而杜赞奇却从中发现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建设”在村落社会里遭遇到“权力的文化网络”的阻击现象^③。

如果说人类学对个体村落的民族志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丰富的人文类型的话，那么，多村落和“超村落”的乡镇研究则把我们的视野从单个的村庄，转向了对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关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宏观的视野

①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③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和比较研究的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深层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但是，无论是村落还是乡镇的人类学研究，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尽管人类学对乡村社会研究取得的成果是人所共知的，但与此同时，它所表现出来的理论困惑和方法缺失，使得人类学对村落社会的研究面临着“超越自我”的挑战。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从理论到方法上的发展滞后。

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向是小规模的原始部落社会，人类学总认为这类社会结构简单，文化同质性高，易于对整体加以观察，因此，当人类学转向对复杂社会的研究时，就遇到了从理论到方法上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人类学得之于对“原始”民族研究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如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概念在同质而稳定的小型社会极为重要，但在乡民的市场或都市的邻里就显得不够用了；另一方面是方法和方法论的滞后，更严重地说甚至是缺失，才是造成人类学对复杂社会研究的困境。

2. 村落研究的方法论

(1) 村落研究中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合流

对中国村落社会的研究从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分野来说应该始于社会学。最早对中国村落社会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Kulp）。1925年葛学溥对中国广东凤凰村研究的著述《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得以出版。该书的主要资料是他的学生和他本人在1918年、1919年和1923年在凤凰村的调查所得。尽管本书记录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但从他本人的理论研究取向和方法的应用上来看，本书是一本关于家庭